

慈禧与中国早期新闻法律



曾经不可一世的慈禧

晚清政府已经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可以无法无天的时代。慈禧一怒之下处死一个记者，最终却引来了一连串难以应对的后续效应……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后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沈葆在日本一家报纸供职，

密约签订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相关的内容，并把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提前发表。此事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恼怒。1903年夏，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捕了沈葆。

当时，正邻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对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须让沈葆死，所以，监狱有关人员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葆，导致沈葆“血肉飞裂”，

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

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戊戌变法中支持光绪）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王照回忆，杖毙沈葆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葆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

不久，关于沈葆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沈葆的惨案被《大公报》等报纸公开后，还引起全国性的反清风潮。

一次，慈禧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谈到沈葆案件的时候，“皇太后亦颇有悔意”。

当慈禧表示“悔意”讨好国外公使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残酷杖刑，已经为反清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动材料。

在上海，更是有数百人出席追悼沈葆的大会，会上宣读的《祭沈草文》，号召人们“犁清廷，复九世之仇”。

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国，不仅仅有政府，还有大量的

报纸。在一个有独立报纸的年代，政府已经很难操控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此后，《大公报》连续发表7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媒体的宣传，让当时的许多人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做言论权。这一次“因言获罪”的案件，在媒体和民众的交互影响下，继续放大。

沈葆案还有以后的《苏报》案、《大江报》案等一系列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例，让清政府开始反省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5大臣先后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他们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

在国外考察中，载泽等大臣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言论自由，并表示了赞誉。不过，他们主张在中国推出新闻法的理由是：“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也就是说，由于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控制，尤其是租界媒体，更是让清政府鞭长莫及，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的空间，同时，也可更好地进行控制。

1906年开始，《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等新闻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

(摘自《扬子晚报》)

“对台戏”：海峡上空的广播战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海峡两岸曾经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宣传战。

喇叭、广播宣传政策，骨肉至亲隔海诉家常，“糖衣炮弹”漂洋过海，在人心的最柔软处，两岸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政治炮兵”

1953年3月5日，位于厦门角屿岛的对金门广播组成立，向金门守军展开了“攻心战”。吴世泽是角屿广播站的第一批播音员。金门那边后来也如法炮制成立广播站。这是一个双方高层都极重视的“第二战线”。

1953年，吴世泽23岁，正在部队里做文化教员。广播组一开始用的喇叭是美军舰艇之间喊话的工具，一个扩音器的功率是250瓦，9个扩音器组成一个大喇叭后，广播起来就威力无比，可以把声音传到10公里远的地方。吴世泽他们把这种大喇叭戏称为“九头鸟”，天天用它向金门广播。节目内容有“国家的建设成就、对待降兵的政策还有蒋军士兵在大陆家属的喊话”。

与吴世泽同在角屿搞广播的田万恭说，大家动不动还要来一场“现场直播”。比如，有时候看金门守军开始修防御工程，挖坑道，就说“又挖工事啦，不要这么辛苦啦”；有时天气不好，可能要下雨，从望远镜里看见金门守军晒着被子，马上通过广播对他们喊“要下雨啦，大家快收被子吧”……

在“九头鸟”高歌半年后，台湾方面也弄来了日本产的大喇

叭，安装在正对角屿的金门马山，展开了“反攻心战”。一场热闹如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的广播大战就此正式开始。

“攻心战”

当年的老广播员们回忆起来，在所有的广播内容中，“国民党军中在大陆的亲属喊话是最震撼的”。

一次，厦门广播组探知金门守军的一个师长是湖南人，他的老母亲还在湖南老家，于是广播组就前往湖南录了音，回来在“大喇叭”里反复播放。金门那边有士兵听到了，就过去向师长报告：“你妈妈在对你说话了”。师长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因为他接到的消息是他母亲早已经被“整”死了，后来终于忍不住，就以查岗的名义来到海边听广播。

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还有母亲讲的家事：“儿啊，你当时说一两年就回来，怎么现在还不见人啊？你给我的光洋我现在还留着没有用，你老婆现在做了文化教员，你小孩在小学读书，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就是缺你一个……”师长听了之后就愣了，回去的路上一句话都不讲，得了“思乡病”，一连两三天都没上班。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说“他的脑子被中共洗了”，就把这个师长调回台湾岛了。

在家属喊话之外，吴世泽说，他们还搞“请客”听戏，同样是以乡情为主打。金门的广播站则以播放台湾民谣为主。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

的歌声成了“心战法宝”。

从打嘴仗到放烟花

“陈菲菲小姐”，这五个字当年响彻金门。1955年，陈菲菲19岁，是31军文工团团员。闽南话和普通话都讲得很好，于是被上级选派到何厝香山广播组对金门做广播。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后，很多当年驻守金门的老兵来到厦门，都要打听她。

金门马山广播站的女广播员汤丽珠是陈菲菲的“老对手”和“老朋友”了，通过望远镜陈菲菲可以看到汤丽珠“穿着超短裙”出来散步，并觉得“她的身材很好很漂亮”。在广播里，陈菲菲也不时会直接“点名”：“汤丽珠播音员请注意……”那边的广播和传单则反过来“点”陈菲菲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虽然广播里两个人总是“死对头”，但是“嘴仗”打久了打出默契，那就是一定不搞针对个人

的人身攻击，逢年过节还要互相问候一下。

在“八·二三炮战”之后，厦门金门间的大规模炮战逐渐变成象征意义的零星炮击。而这也演变成奇特的战地奇观，那就是依照规定，在炮击之前，厦门这边的广播组一定要一遍遍地广播：“我们打炮不打村庄，不打民房，只打空地，打海滩……”还要告诉金门那边：“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同样金门那边也会广播：“共军兄弟们，请你们躲进掩体，我军要放炮了……”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金门的炮击。“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改成了“厦门对金门广播站”并于1985年率先停播。随后金门也停止了到厦门的广播。

在当年广播员们大唱“对台戏”的海边，如今在春节时升起的是厦门、金门两地同时燃放的烟花，两地人民用这份灿烂互致问候，共庆大年。

(摘自《南国都市报》)



1952年8月24日,从金门岛眺望大陆。(资料图片)

“太平轮”事件

有人称太平轮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1949年1月27日子夜，中联公司“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建元”号3人、“太平”号38人），其余近千人遇难，史称“太平轮事件”。

“太平轮事件”发生时，正值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场惨败，解放军向长江北岸集结。许多人一心想逃离大陆，到台湾的机票和船票班班客满，一票难求。

于是，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太平轮，自然也就票价高昂而且人满为患。那时候，上海港口司令部为保证人员和物资调动的畅通，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在此期间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中联公司”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多赚钱，不仅让太平轮在夜间违规出航，而且专走狭窄水道，不走正常航线……结果，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航行的建元轮。

太平轮是美国Manitowoc船厂制造的大湖型客货船，1920年下水，排水量2500吨。1946年，美国在处理战时物资时，将其折价17万美元，卖给了中国。

“中联公司”由宁波籍商人合资组建，总部设在上海的四川中路。它的靠山是陈仪和徐学禹——陈仪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徐学禹是徐锡麟（清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革命志士）的侄子。

1949年1月27日晚，太平轮上载了一千多名旅客，还有中央银行的账册，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和军需物资等，严重超载。由于是小年夜的缘故，有一种说法是，船员有些漫不经心。

在撞上建元轮后，建元轮吨位较小，立刻沉没；而太平轮大量进水，在撑了15分钟后，也不幸沉没。数小时后，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前来，救起41人，其余乘客全部遇难。

在当时遇难的乘客中，颇有几位名人。例如：著名音乐家吴伯超、前辽宁省主席徐箴、山西籍国大代表邱仰浚等。

太平轮的悲剧一直流传至今，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就将故事中的女主角描写成双亲在太平轮事件中遇难。后来《谪仙记》被大导演谢晋改拍为电影《最后的贵族》。

(摘自《南方网》)

陈云“为党谋财”

陈云为党谋财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陈云在这种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除了做好保卫中央的工作，陈云还兼顾筹集党的经费的任务。

陈云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

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些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40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当时，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是“公司”的“书记”，代号是“先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煤铺的账房先生。谁会想到，一个其貌不扬、总在一角拨拉着算盘的账房先生，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呢。

(据《老年生活报》)